

看世界

美国“斩杀线”如何让人出局

近日，美国“斩杀线”现象引发广泛关注。

“斩杀线”概念源于游戏术语，原意是指游戏中的角色进入完全没有“回血”余地的濒死状态，任何伤害对其而言都可能是致命的。在网络上，该词则被引申用以描绘许多美国普通人的“财务紧平衡状态”。

这也是了解美国“斩杀线”问题首先需要厘清的一个概念。

在美国语境下，所谓“斩杀线”并不等同于用来界定最低生存标准的“联邦贫困线”，反而更接近一种由制度结构塑造的抗风险阈值。徘徊在“斩杀线”附近的群体，或许从表面看尚可维持生计，但却处于储蓄能力有限、保障资源匮乏的高风险暴露状态，失业、疾病……随便一个突发事件就会打破这个脆弱的平衡，而联邦与州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体系往往难以提供有效“兜底”。

综合来看，三刀“切割”共同构成了美国“斩杀线”的运行逻辑。

第一刀体现为“利益—风险分配”的不平等，这决定了“谁处于风险前沿”。

在美国高度集中的财富结构下，与收入鸿沟相伴的是风险承受能力的明显阶层化。美联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美最富有的0.1%家庭掌握了约13.8%的全国财富，而底层50%的家庭财富占有率为2.5%，财富高度集中直接导致风险抵御能力分化。另据银率网2025年的报告，仅有约46%的美国成年人有“足够支付3个月基本生活开销的紧急储蓄”，这意味着，超过半数美国家庭一旦遭遇重大风险就无法维持正常生活。

更重要的是，高收入阶层能够通过资产多元配置、税收优惠、私人保险和金融工具等方式实现失业、医疗和住房“风险外包”，在关键生活领域具备以“钞能力”消化制度风险的底气；而中低收入群体则高度依赖劳动收入，普遍缺乏足以应对危机的流动性资产及财务缓冲能力。上述结构性分配借由制度设计将社会风险持续下沉至下层群体与“准中产”群体，在社会结构中塑造出一条风险高度集中的“斩杀线”。

第二刀是有条件的社会安全网，它建立

在对稳定就业与长期缴费的严格把控上，排除普遍兜底保障。

美国联邦社会保险制度规定，个人必须缴纳社会保障税累计至少40个积分点才可申领与就业经历挂钩的退休或残疾福利。按照社会平均就业及分配水平核算，这一标准需要10年左右的全职工作才能达到，长期从事零工、兼职或只能实现间歇性就业的群体很难达到资格门槛。

美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则更为复杂。在整个人体系中，雇主保险居于主导地位，2024年，约53.7%的美国人据此获得医疗保障，但不同行业、企业、职位员工的参保连续率、实际使用率、自付率、报销比例以及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等指标差异巨大。公共保险看似可以提供普惠型保障，但却依赖收入、年龄、健康状况等筛选机制，准入条件严格。个人投保市场的“补贴”条件、保障水平和成本更是因人而异，许多保险计划看起来保费低廉，却可能在参保人罹患重大疾病或需要住院时“失能”，参保人仍需自己负担高昂的费用。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现象是，失业保险在各州的可及性和替代率也大相径庭。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2024年有35%到40%的低收入群体在失业后全无保障，且失业6个月后贫困率大幅上升，最高可达45%。由于美国的社会保障以稳定劳动关系为隐含前提，对脱离就业状态人群非常不友好，失业群体有很大可能性被持续排斥在核心保障外。在这套逻辑下，社会保障的角色已经由普遍性兜底转向对“合格劳动者”的变相筛选，而掉到“斩杀线”以下的个体被普遍视作“自我风险管理失当”的失败者，将其从社会安全网中排除反而被赋予了制度层面的“合理性”。

第三刀是“福利悬崖效应”，其含义是，部分原本享有福利保障的人还有可能被美社保制度“二次剔除”。

在美国，主要社会福利项目均高度依赖收入门槛与资格审查，缺乏连续、渐进式的退出机制。以医疗补助为例，多数州在《平价医疗法案》扩展后，将资格上限设定为联邦贫困线的138%，小幅增收后的低收入家庭往往需要转向个人投保市场或其他商业保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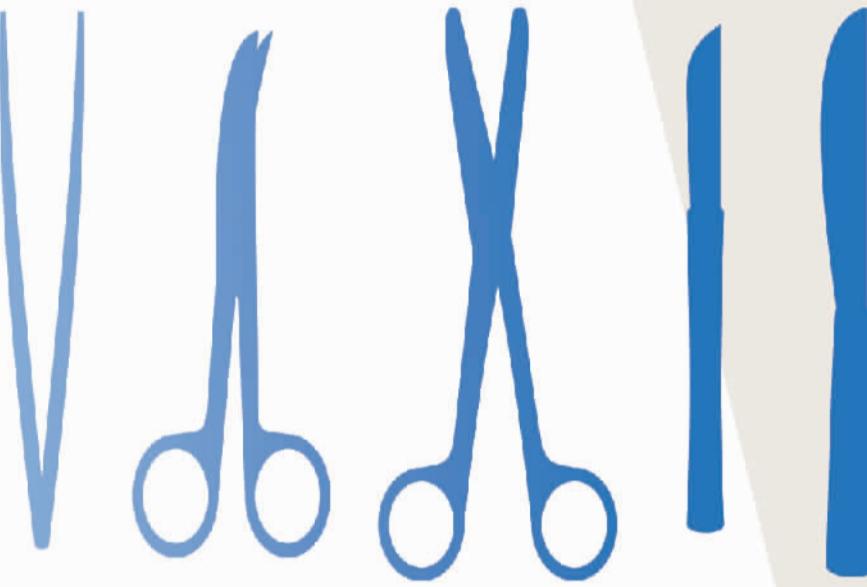
投保，导致其自付保费和免赔额暴增。类似的案例还包括，食品援助（SNAP）通常在家庭收入接近贫困线的130%至150%区间内迅速递减甚至终止；住房补贴、学费减免和儿童照护补贴也普遍采取“一刀切”的非线性原则，一旦超限，立刻终止，没有缓冲。其制度性后果在于，大量中下层家庭的薪水或工时增加无法转化为更高的可支配收入，反倒可能引发医疗、住房和食品保障的集中退出，形成事实上的“负边际回报”。由此，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被稳定地锁死在“既不够穷以获得福利，又不够富以确保无虞”的中低收入区间，这一制度性断裂带中的人们正是美国“斩杀线”最能杀伤的。

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斩杀线”被进一步强化。联邦政府在预算与社会政策设计上遵循“减少依赖、激励劳动”原则，一方面加大对公共福利项目的审核力度，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调整积分获取规则等方式“减轻财政负担”。此外，本届美国政府还提出压缩非国防支出，维持或削减住房、儿童照护与营养补助等社会服务项目开支，使得这些福利在资格判断上更加严格，实际支出进一步收缩。这些调整不仅严重削弱了政府的公共

风险分担职能，增加了各项基本保障断裂风险，还使得勉力求生的中低收入家庭更易遭到社会安全网的制度性“挤出”。

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斩杀线”比联邦贫困线更为残酷，因为它使个体在尚未赤贫之时便被判定为“风险抵御能力不足”，并在美国社会所谓道义与政策层面同时失去被保护的正当性。这种逻辑根植于资本主义的价值秩序，即在制度层面假定市场竞争结果正当合理，将社会资源分配与个人竞争力紧密捆绑，把生产能力、就业能力甚至健康状况均纳入资本评价体系。同时，该逻辑还呈现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包括将不平等美化为“生存竞争”，将健康危机、由经济结构变化引发的就业冲击等社会议题，异化为个人努力不足、能力缺失或道德逾矩的直接后果。在这套体系下，所谓“社会保障制度”的真实含义并非兜底，而是通过收入、就业、福利等领域层层筛选，将社会成员按照能力、价值实施分配或淘汰。其最终结果是，个体只能在反复的风险暴露中被迫为制度的不连续与结构的不公平埋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脑洞

现在到底几点了？

王一伊

时间在大部分人的脑海中都是一个始终单向流动的概念，所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然而，在一些地方，时间每年都会出现一次字面意义上的“回溯”：在11月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点，将时钟回拨1个小时；在来年3月第二个星期日的凌晨2点，再将时钟拨回去；直到同年11月，再一次重复这个流程——这就是所谓的夏令时(DST)制度。

夏令时制度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对太阳时间进行调整的试验之一”——全球曾有半数国家遵循这种调整方式；如今，美国部分地区、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和地区依旧保留着该传统。

夏令时的概念早在20世纪之前就已出现，但直到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才成为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令时的国家。其理由非常好理解：在白天工作能够减少电力消耗，还方便工厂延长工人劳动时间。2年后的1918年，美国通过《标准时间法案》，一方面确立了全国官方时区，另一方面也引入了夏令时。不过，夏令时的相关条款在一战结束后就被废除了。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启用夏令时制度，直到战后才将“时间决定权”交给各州或城市自行决定。然而，这一举措不出意外地引起了极大混乱，尤其是在交通和广播行业。于是，该标准又被废除。

之后，类似的尝试在美国历史上又反复了许多次。最惨烈的一次失败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

1973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推行夏令时制度的法案，并由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

成为法律。起初，美国民众对此非常支持：当月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有79%的人赞成这一变革。

1974年1月6日凌晨2点，美国大部分地区统一将时钟拨快。

尽管有差不多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混乱依旧没能避免：航空公司倒是及时更新了航班时刻表，但不少旅客却因此错过了航班。在一些日出时间较晚的地区，孩子们不得不在黎明前出门、在黑暗中步行上学。当时，不少媒体都刊发文章建议孩子们为了安全一定要随身携带手电筒，并穿上反光衣物。然而，悲剧还是接连发生。短短几周内，多个州都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多名儿童葬身车轮之下。

由于公众情绪的反转，仅仅不到1年时间，1974年10月初，国会就投票决定恢复标准时间，参议院随后也表示认可。根据当年的史料，尽管该政策在1974年1月至4月期间每天节省了约1万桶石油，但公众的厌恶情绪显然不是这些利益可以抹平的。随即，继任的福特总统签署了将全国时间恢复为标准时间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自1974年10月27日起生效。

事实上，直到今天，美国各地对夏令时制度的讨论依旧没有结束。

医学及健康领域专家普遍对夏令时嗤之以鼻。因为科学研究表明，时钟调整与睡眠紊乱、血糖管理、心脏病以及中风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之间存在关联。

交管部门同样持排斥态度。西班牙研究人员收集了1990年至2014年该国各城市的

事故增加了30%；而在时钟拨慢的那天，同类事故增加了16%。

此外，还有多份权威科学杂志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系统性地探讨了夏令时与工伤事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时钟拨快后的第1个周一，各地工伤事故发生数量都有所增加。

美国中部和西南部几个气温相对较高的州也明确反对夏令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发现，由于该州气候炎热，人们下班回家后普遍需要使用空调，所以实行夏令时反而会增加能源消耗。该大学还预计，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严重，未来夏令时在节能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小。

不过，休闲娱乐、餐饮、户外等消费终端行业大多比较欢迎夏令时。他们的理由是，执行夏令时的国家和地区下班时间较早，人们能有更多时间进行消费。而且，下班时天色越亮，人们越有可能相约出门。

目前，美国至少有45个州已经考虑过或正在考虑通过立法将夏令时或标准时间永久化。旨在让美国永久采用夏令时的《阳光保护法案》自2018年起多次提交国会审议。该法案已于2021年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目前仍卡在众议院。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美国将再次把时钟拨快，而且，有可能再也不会拨回了。

马来西亚首家机器人体验馆日前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沙阿兰正式开业。体验馆由中国智元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元机器人”)与马来西亚企业i-City联合打造。这也是智元机器人的海外首家机器人体验馆。

走进这座名为i-City AI World的体验馆，智慧赋能生活场景的应用逐步呈现。

馆内，智元全系列机器人化身百变角色，打造“赛博世界”。入口处，舞狮表演与二十四节令鼓的机器人演奏相映成趣，传统文化与前沿科技交融。远征A2具身智能机器人变身场馆“服务官”，可与观众互动合影，并使用英语和马来语迎宾导览。现场观众可体验机器人射箭，感受精灵G2遥操作的超低延时和超高精度。

另一边，灵犀X2机器人能文能武——“文”能科普教育，“武”能带来酣畅淋漓的拳击表演，跳舞、踢足球、打地鼠更是不在话下，逗得观众眉开眼笑。

来自吉隆坡的参观者阿米尔在体验后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人形机器人。“以前更多是在视频或新闻里看到机器人，这次可以直接和它们互动，感觉AI已经真正走进了日常生活。”他说，这样的体验有助于民众更直观地理解AI技术，也能激发年轻一代对科技创新的兴趣。

马来西亚科技与创新部长郑立慷在开业活动上表示，AI等技术正深刻影响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就业发展与人民生活。这座体验馆是马来西亚实施国家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引领区域发展的关键一步。马来西亚政府将与体验馆等相关方在教育、技能提升等领域开展合作，培养具备数字素养的未来型人才。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马来西亚当前的机器人与AI布局，正处在从政策推动走向应用探索的阶段。围绕教育、服务和示范应用展开的探索是现实背景下的务实路径。

此次体验馆开业，也成为中国机器人企业进入马来西亚市场的一个具体案例。智元合伙人、联席总裁姜青松表示，智元选择在马来西亚布局，不仅是积极响应马来西亚发展战略，更希望将人形机器人技术带入亚太市场，助力区域产业智能化发展。

近年来，中马两国在机器人等领域的互动与合作不断展开。2024年，中国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依托马来西亚拉曼职业技术学院，建设马来西亚海外分校，向马来西亚输出工业机器人专业教学课程。2025年，马来西亚机器人代表队到中国参加世界青少年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中国邀请赛，获得邀请组别总冠军。

马来西亚第一副总理扎希德此前表示，通过与中国科技巨头合作，马来西亚引入5G网络、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中企将机器人、AI和大数据等技术整合到马来西亚工业生产过程中。

目光再次回到体验馆内，机器人不再只是展板上的技术参数，而是成为可以交流、互动和参与日常场景的一部分。对不少参观者而言，这次“面对面”的体验，也让AI从抽象的概念，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王嘉伟

程一恒

「面」

本版编辑 韩叙 美编 王子萱
来稿邮箱 gjb@jjrbs.cn